

(← 上接第A13版)

民国医学教育家李宗恩最杰出的业绩是创立贵阳医学院和战后重建协和医学院。本书的第三个特点是在重点讲述李宗恩上述两大业绩的同时介绍了他在不同时期对中国医疗卫生事业全盘问题的思考和建树。比如1931年汉口水灾后虽然没有流行大疫，但死于疾病的灾民超过被淹死的人数。以130位医生的薄力如何能保证九万难民以及几千万灾民的健康？从难民医院回到整洁有序、设备精良的协和医院，李宗恩陷入了思考。1937年的贵州省



李宗恩（前排左四）与贵医护校46年毕业生合影

流行病猖獗，鸦片泛滥，新生儿死亡率居高不下，全省1000万人口仅有120名注册医生，使前来创建贵阳医学院的李宗恩陷入更深的思考。协和医院实行精英教育，8年学制、英语教学。李宗恩和很多同事很早就意识到这样培养出来的医生不仅数量上远远不能满足中国4亿民众的需求，而且习惯于英语教学和日常对话的学生毕业后也无法很好地为广袤而贫瘠的农村服务。1932年李宗恩和林可胜参加了协和新成立的、吴宪任主席的“中文教育委员会”，商议如何将中文融入教学。基于这些思考，李宗恩在1938年6月提出贵医这所大后方医学院的两大使命：“救济沦陷区医学生之学业”的临时使命和“替西南各省造就一批医事人才，普遍地分布在西南各省，尤其是西南各省的农村”（77页）的永久使命。他还在贵医增设首个医学院校的人文科，开设语言、文学、哲学、逻辑等课程，因为他认为“中国的大学教育，一向就是注重技术知识的灌输，而对于学生整个人格的建立、治学治世治人的良好态度的养成常常忽略。尤其医学教育更是如此”（79页）。抗战胜利后，转移到大后方的大学纷纷迁回内地，教育部决定让贵阳医学院与上海医学院合并，内迁上海。这个决定意味着李宗恩多年来为提高落后地区医疗水平的努力全部白费。为了完成他为贵医提出的长期使命，他和大多数贵医师生发起护校运动，最后教育部不得不收回成命，贵阳医学院得以保存至今。

### 传记的意义

这部传记至少在两个方面具有重要意义。第一，它抢救了被遗忘的历史。章诒和在“貌似一样伶才曲，句句都是断肠声——《李宗恩先生编年》读后”一文中介绍了她在2012年看到的一段视频，内容是一位记者的随机采访——把当下协和的头头脑脑、上上下下，都采访到了。问的问题只有一个：“你知道李宗恩吗？”回答也只有一个：“不知道。”……显然，这是一个被时代遗忘的人，也是被协和忽略的人。为什么“忽略”、“遗忘”？因为他是旧社会协和医学院第一个握有实权的华人院长，更因为他是1957年医药界最大的右派分子”（见“爱思想”网站“章诒和作品”）。传记的正文告诉我们，美国洛

克菲勒基金会成立于1913年，其使命是“提高全人类的福祉”，1917年馈赠给中国的协和医学院就是该基金会使命的一部分。1921年小洛克菲勒在协和医院成立典礼的致辞中说：“无论西方医学能为中国提供什么帮助，对中国人来说并不一定实用，除非它被中国人接管，并成为中国国民生活的一部分。我们必须期盼，在未来的一天，这所学校大部分职务都由中国人担任”（29页）。1947年李宗恩作为第一位中国人院长的当选是朝着小洛克菲勒愿景迈出的的一大步，而他此后兢兢业业的工作不仅是为了完成洛氏基金会“提高全人类福祉”的崇高使命，首先是为了让他的中国同胞能够得到更好的医疗卫生服务。然而，洛氏基金会的至善使命和李院长确保协和标准的大功大德却在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特别是反右斗争中变成了美帝国主义“侵华”的至恶和李宗恩“散布帝国主义奴化思想”的至罪，他的名字也随之在协和史和人们的记忆中被抹去。（另一方面，协和却一直由政府指定为特权阶层服务的、设有高干门诊部和高干、特需病区的医院。）我在此文开头讲到留美的药理学博士的孙女为留英的医学教育家爷爷作传是鲜有所闻的美谈，其实，传记的后半部让人读来感到句句都是断肠之声。感谢李维华倾十年心血之劳作，已经被遗忘的历史今天复原了，使我们能够系统地了解李宗恩在民国医学教育史上的巨大贡献和他在1949年后的历次运动、特别是反右斗争中蒙受的清白之冤。

本书的第二个重要意义在于它提供了一个契机，使读者重新思考中国改革开放前三十年和后三十年“两个不能否定”的理论的荒谬性。反右斗争中，毛泽东的私人医生李志绥向他报告协和医院发言人斥责李宗恩向党争三权。毛笑着说“这三权是党领导的具体表现，将这三权交出去，党还领导什么？”李宗恩就此成为毛泽东“钦点”的右派（176页）。大会上批判李宗恩的不仅有党员教授，还有包括胡正祥、张孝骞、林巧稚等和李宗恩一起工作了多年的同事和好友，甚至李宗恩的长子。1966年开始的文革中，张孝骞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特务”，备受侮辱和折磨；林巧稚被划为重点改造对象、“反动学术权威”，发配到病房做护工；胡正祥这位留学美国、一心报国的学者不仅被作为“反动学术权威”批斗，而且“在朝鲜战争中为美帝国主义制造了细菌武器”遭到毒打。最后他和他美国华侨的妻子不堪毒打，双双自杀身亡。这几位杰出学者对李



1930年代，李宗恩（中）与北京协和医学院内科教授

宗恩的批判和后来自己的遭遇是中国改革前三十年社会割裂、是非颠倒、人人自危的一个缩影。李宗恩去世17年后，卫生部于1979年发文，称“1958年1月，将原协和医学院院长李宗恩同志划为右派分子，属于错划……

【现】已给予改正，恢复政治名誉（222页）。”看看李宗恩被协和遗忘的现状，这样的改正有什么意义呢？传记“附录三”里，李宗恩的小妹李宗蕖写道：“十年动乱后，常挂在人嘴边的一句宽慰人的话：向前看吧！对那些在屈辱中老去的人，向前看，能看到什么？为什么不提醒一下带来这场灾难的人们多回顾一下，悟出些酿成这一悲剧的原因（224页）？”她的话令人想起作家冯骥才在他《一百个人的十年》“前记”里关于文革的话：“尽管灾难已经过去，谁对这些无辜的受难者负责？无论活人还是死者，对他们最好的偿还方式，莫过于深究这场灾难的根由，铲除培植灾难的土壤。一代人付出如此惨重的代价，理应换取不再重蹈覆辙的真正保证。”然而，由于“两个不能否定”理论当道，在当今的大陆反右、文革的话题都属于禁忌，本书也因此不能在大陆出版。1978年，南京大学教授胡明福“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发表，在全国引起强烈的反响，形成了一场广泛而深刻的思想解放运动，为共产党抛弃“两个凡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这些以前至高无上的金科玉律扫清了障碍，开启了中国后三十年的改革开放。希望本书的出版促使读者打破“两个不能否定”的理论，深究前三十年灾难的根由，铲除培植那些灾难的土壤，换取今后不再重蹈覆辙的真正保证。

传记正文以下面这样一段话结束：“2015年1月30日，李宗恩于1938年创立的贵阳医学院更名为‘贵州医科大学’，在其花溪新校区里有两面文化墙，一面是李宗恩等数十位贵医创始人的头像，另一面是贵医创立时由校长李宗恩提出的校训：‘诚于己，忠于群，敬往思来’（184页）。”与李宗恩在协和复校后的遭遇相反，这段话给刚刚读完断肠之声的读者不少安慰。传记的“后记”还告诉读者，李维华出生时爷爷梦想着挽着孙女的手在街上散步的一天（270页）。爷爷的梦想由于他受到的清白之冤而没有实现。我想，本书的出版也可以说是李宗恩关于孙女梦想的一种象征意义上的实现吧。